

四会党史资料



中共四会县委党史办公室编印

四会党史资料选辑

(第四辑)

肇庆市党史资料丛刊

封面设计：陈均浦

主 编：龙炳森

编 辑：黎国荣、黄建灵

赖悦祥 陈 锋

中共四会县委党史办公室编

广东省四会县印刷厂印刷

一九八九年五月出版

广东省出版刊物印刷许可证144号

编辑的话

为了帮助读者了解抗日战争时期四会党组织活动的基本情况，我们在四会县委党史办公室征集的资料中，选编了这一时期有关老同志的回忆录十六篇，和有关同志对这一时期四会党史一些问题的调查考证文章四篇，汇编成《四会党史资料选辑》（第四辑），内部出版，以飨读者。

在编辑过程中，得到有关单位和老同志的大力支持和帮助，在此表示感谢。

由于水平有限，缺点、错误在所难免，欢迎批评指正。

一九八九年五月

目 录

〔回忆录〕

梁嘉同志在四会党史座谈会上的讲话	(1)
欧新同志谈四会党史	(14)
我所知道的1939年下半年至1940年底四会党组织 活动的一些情况	杨 明 (35)
潘莱曼同志谈抗战初期的四会党组织的一些情况	(50)
谈谈与黄显声同志参加四会革命斗争的 一些情况	黄 梅 (53)
陈锋同志在四会党史座谈会上的发言	(63)
我知道的党在黄岗小学的活动	张文嘉 (73)
一所“红色学堂”	
——回忆抗战时期党在黄岗小学的活动	
.....陈重文、严文彪、严文媛	(77)
访问张华同志	(88)
重访张华同志	(97)
我和冯燊同志在四会	李 青(106)
访黄松坚同志	(111)
我在四会进行革命活动的片断回忆	何俊才(113)

回忆我党在四会、清远边境活动的一些片断	钱清(119)
严机同志在四会党史座谈会上的发言	(125)
我们在四会隐蔽	司徒明(134)

〔党史资料考证〕

对大革命时期中共四会支部建立时间的看法	
.....黎国荣、龙炳森、赖悦祥(141)	
关于1938年冬——1939年冬中共四会党组织 一些问题的考证	赖悦祥、龙炳森、黎国荣(149)
对侨港会宁同乡会回乡服务团党组织之我见	
.....龙炳森、黎国荣(158)	
广东青年抗日先锋队总队部成立地址的调查 和考证	赖悦祥(164)

梁嘉同志在四会党史 座谈会上的讲话

听了张业湘同志的介绍，我们知道四会县委第一书记张承玉同志今天上午从省委党校赶回来参加这次会议，这说明县委对搞好党史资料征集工作是很重视的。我非常高兴。我想，四会的党史资料征集工作，一定会搞得好。

搞好党史要领导支持，这并不是一句空话。我参加过广宁、德庆、郁南、罗定、云浮等县的座谈会，新兴、高要找我谈过，在这些地方，都有个很重要的历史问题需要澄清。这个问题是带有全地区性的，就是把我们党（地方党）说成土匪党，地主党，把我们的游击队（人民武装部队）说成土匪部队，地主武装，把我们原来参加工作的同志说成旧基层。这就是大是大非问题。这个问题很重要，现在张书记来了，我们有机会把这些问题讲清楚。首先，讲武装。是谁叫我们搞武装？是省委叫我们回来搞武装的。叫我和王炎光、欧新回来搞武装的。纵然中共中央正式授命的，完全是党领导的武装部队，怎能叫土匪武装呢？虽然那时候没有戴上红五星的军帽，但都是穿解放军衣服的。从领导人来说，无一个是地主。我家里不是地主，相信谢斌更不是，王炎光也不是。这

些都是自己的子弟兵。我们武装的宗旨在抗日战争时是打日本，在解放战争时是要打倒蒋介石。我们的宗旨很明确。在经济上，我们的主要来源靠广大群众支持，另外靠打“灰条”。打反动派，维持地方治安。群众同我们的关系是鱼水关系。我们的士兵当中有原来的优良传统，是为群众做事情的，一年两造都帮助群众劳动。这些，无论是建党建军都是这样搞的。统一战线的政策，我们大有大的统战，小有小的统战。如对四会县长周东，有一个时期，陈德还是做他的工作，争取他支持我们抗日。在区乡来说，只要他能支持我们，我们还是利用他，或者争取他中立。所以，我们的所作所为，都是按照毛主席的建军路线、建党路线以至统一战线来做的。因此，我们绝对不是土匪，不是土匪部队。由于这个是非问题搞不清，所以在历次政治运动中，都有我们的同志受到委屈，有的被打下去迟迟才出来，有的含冤而死。如四会的陈德，曾经去过延安，他的死到现在恐怕还搞不清楚。昨天，参加会议的老太婆都去探望陈德的爱人。今年八月中旬，省委开会时，我把这个问题提出来，我说：这个问题，是历史上的大误会。我们办事情应该讲历史唯物主义。我要把历史上的真实情况告诉大家。会议把我这段话印在简报里。为什么会产生这个问题，我是这样分析的：一个是把我们这里的情况同延安、同北方比较。怎能够这样比较呢？例如，我们这里入党过去是怎样入党的呢？如果是在部队入党，还可以鼓掌；如果是在地方入党，最多用两只手指暗示一下表示欢迎欢迎！那时，我们都是拿着人头行路的，那个不担心危险呀？那个会知道我们今天做官呢？无人想到今天自己会做官的，大家都是为了革命。昨天何俊才同志说到

我们的理想问题，我非常有感触。前段我去开平，有的公社书记讲计划生育问题，讲到一个干部生第三胎，当时动员他爱人打胎，他根本不理睬，孩子生出来后，组织要开除他，他又不理睬，还说什么我已经生咗仔啰，无同你咁好气讲。我为什么讲这些呢？因为在理想问题上，他是为了革命或者是为了什么，这个问题对我有感触。拿我自己来说，我的一二、三、四仔都是送给救济院或别人养，大仔亚适是司令员的勤务兵，他初时是送给救济院养的，饿到快死了，刘田夫就叫他返来部队；第二个仔给别人养；第三个仔也是送给人，第四个仔也是送给人养，后来死了，难道我们无仔女感情吗？陈其略爱人在扫荡最紧张的时候生小孩，没有办法，只好夹硬焗死。我们这样做为了什么，无非是为了革命。把我们这些同志通通当做敌我问题，这怎么讲得过呢？我说这个问题是历史的误会，就是说，有些人不了解历史的情况。在生小孩问题上也是一样。一般来说，现在有个仔就好咯，无你咁好气，这是一种想法。另一种想法，过去生了小孩出来之后，为了革命，为了党，而可以不要自己的子女。还有我们那时搞革命，不是为了今天做官，没有一个人会这样想，因为那时候谁都不知道自己什么时候死，大家都是拿着人头去搞革命的。老实说，我们如果知道今天会做官，那么就不敢革命了，因为明摆着死的又何必这样呢！欧新同志今早讲，那时候大家都很遵守纪律，白天黑夜叫去哪里就去那里，无饭吃都去。那时边有钱呢？我们在座的许多同志都被捕过，受过刑。牛嫂同郑少康北撤时负伤，被敌人抓去电刑电到呱呱叫，那时如果她们稍为暴露一声就不得了了。西江特委书记、组织部长，南路特委书记，三角洲特委书记，粤中特委

副书记，所有交通她都知道，她暴露一声，你想，我们会怎样呢？但她一声不说，只希望敌人快些杀死自己。这不是刑场上考验吗？我不是表扬，我一些都无意表扬这个问题，我只是拿这些事例来说明我们过去的斗争。所以我说不了解历史情况，把这些情况同大解放区比，或者把现在的情况同我们解放区比，加上左的路线影响，而左的路线又容易上纲上线。你打烂一个茶杯可以上纲上线说你是反革命。老欧你为什么打烂个茶杯？茶杯是社会主义的茶杯，你打烂茶杯就是反社会主义。咱就够了，容易得很嘛。现在县长、书记都在这里，对我们解决问题很有帮助。所以谈党史我赞成何俊才同志的几点意见。不仅是要分清是非，教育后代，同时也是教育了自己，对现在工作的指导意义也在这里。王炎光同志今天上午对一些问题作一些自我批评，我觉得非常好。这个问题不是王炎光同志本人问题，是当时的一种思潮在这个地区的影响。王炎光已经作了自我批评，讲他自己要负责任。当时我做地委书记，我也应该担些责任，这样公道嘛。你不解决好这个问题，很多历史上的冤假错案也就无法解决好。今天张书记来了，我非常高兴，把这个问题讲讲。因为这个问题不是一个县的问题。这个问题在四会还不是很严重，比较严重的是广宁、郁南、云浮等县。这个问题是个很严肃的问题。我相信，在县委的重视和支持下，我们这些问题一定会解决好的。有些问题虽然暂时未有解决好，但将来一定会合情合理解决好的。这是我首先谈的意见。

其次，谈到四会的党史问题。我觉得四会党、四会县人民对革命是有过很大贡献的。大革命这段我不大清楚。但是，从我们进入四会以来，我们知道大革命时期陈伯忠领导

农运，知道大革命时候我们这个地方有非常光荣的历史。但仅仅是知道而已，更多的事情我不清楚。因此，大革命这段靠去找未死的人，或者找档案来解决。至于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这段我们大家还在，能够记得几多就讲几多。大家今天所讲的都是一个侧面，你讲你的侧面我讲我的侧面，都需要县委，需要党史办具体搞工作的同志好好地集中分析。我们的讲话也可能有差错，亦可能张冠李戴，但总的来说，我们大家把知道的事实谈出来是非常好的。

四会党的恢复，实际上只有两条线：一条是参加过大革命的同志，抗日时在香港组织服务团回来，到抗先队到四会以后，从抗日积极分子中发展；另一条线是何俊才同志在清、四、三、花边区这条线发展。这次座谈会，首先安排黎百松同志讲，把服务团回来怎样做恢复工作作了一个交代。第二个就是温盛湘。温盛湘谈抗先队来到以后这段，跟着何俊才谈罗源、地豆、迳口这一“边”，加上陈锋谈自己的切身体会，那么地方党的恢复发展眉目就比较清楚了。然后讲到武装斗争这部分。欧新实际是搞武装起义的，两方面他都参加过，他首先讲一部分，然后再讲一部分。接着由老叶讲，怎样以五指山为基地开展武装斗争这个问题。这样武装斗争问题也有个眉目出来了，加上王炎光同志讲怎样奉省委命令，怎样恢复，怎样组织武装等等。县委有意识地把知情的同志这样安排眉目就清楚了。

我现在向大家讲的亦只是讲些线索，讲些骨头。因为位置不同，有许多情况不清楚，只能讲些骨头，讲些线索，把骨架子摆清楚。这样四会党的情况，四会武装斗争的情况，就可以搞清楚了。

服务团来到之后开始做些恢复工作，做些准备工作，以后李守纯来把这个问题进一步发展。我们西江特委是在一九三八年十一月成立。第一任书记是李守纯，我是组织部长，朱荣是青年部长。到一九三九年三月王均予来，王均予是第二任特委书记，我仍然是组织部长，朱荣还是青年部长。同年三月，梁威林来了，他当宣传部长。到一九三九年九月，王均予调走了，刘田夫来了，刘田夫做第三任特委书记，我和梁威林继续是组织部长和宣传部长。朱荣（当时叫朱醒良）那时他到延安参加“七大”，我在一九四〇年五月调去省委学习两个月后，就被调去南路特委。那时，广东已经分开两个省委了，一个粤北省委，一个粤南省委。大概是一九四〇年七月冯燊调到这里当特委书记。以后西江特委改为特派员制，把张华调来，把梁威林调走，冯燊当特派员，张华当副特派员。这是一九四〇年到一九四二年的情况。

这段时间，四会县委的情况是这样的：第一任特支书记陈德，一九三九年三月，调谭丕桓来四会当县临工委书记。九月以后，谭丕桓调到特委办公室，他走后是林媛这个肥女仔来，不久，杨明也调来了，林媛很快调走，林媛走后是林惠谋来。以后四会县委的领导我就不大清楚了。到粤北事件后恢复党组织以来，就是陈德、陈锋来了。

四会党当时是发展得比较快的。特支开始时，在下面认真做了许多具体工作，贡献很大。但真正的形势还是抗先队到来以后。一九三八年十月二十一日，广州沦陷，抗先队从广州撤退，那时李大林参加了，带队的有我一个，陈恩一个，黄泽成一个。于光远也随队，但于光远因民先问题无职务。我们抗先队四百人左右。撤出广州时，东边打炮我们在西边

走，走了三天到四会，在四会凤凰村休息编队。大概编了三十几个队，有人讲四十几个。我记得西江除了封开以外，其他各县都有我们的抗先队，会宁两个县有三个。在抗先队四百几人当中大概有五分之二留在西江，五分之三由我带去北江。中间留清远一个，琶江一个。从这里到清远，到翁源，到坝子，到龙仙，足足行了十日才到。去到龙仙后，我把队伍交给邓楚白（邓现在华东海军任政委），后经韶关回来了。那时后，留在会宁的抗先队，由温盛湘他们几个人带领，同服务团结合起来活动，两者已经不分，需要出席时用服务团，不出席时同锅吃饭，大家同捞同煲的，一起工作。正是由于这样，所以四会那时党发展很快。发展的线索大体上是三个方面：一部分是在四会城里一些职员；第二部分是小学教师；第三部分是工人、农民。主要是在大沙、邓村和黄田发展了一些。在小学教师发展的比较多些，包括上下茅以至地豆、威整、黄岗地方都有发展。这是一条线。但是，现在做事后诸葛亮来讲，我们发展农民党员还不够，如果发展农民党员多些，我们的基础会更好点。另一条线，就是税警总团即暂八师的一条线，那里有个特别支部。由于田竺僧这个人身份不清楚，所以来特委停止了税警团那个部分的党员，一个个审查后恢复返来。另外，罗源方面，就是何俊才这部分。何俊才这部分在后来的武装斗争中是影响比较大的。所以苏陶后来发展到罗源、迳口、大南山一带的游击战争，都是靠那边的基础。这个问题钱清比较清楚。

我们当时的工作，主要是做宣传抗日和组织群众工作。至于抗日宣传就多种多样了，口亦讲，标语亦来，又做戏之类。除此之外，很重要的宣传工作是我们的书店。那时，我们特

委是有意识地搞几间书店的。在全西江四会一间书店，罗定一间书店，还有郁南、新兴、肇庆。四会书店比较长命一些，到一九四一年才结束。为什么会长命一些呢？就是我们的工作方法问题了。它不单卖进步书籍，还卖学生课本，字帖什么都卖。无罗定~~咁~~红，罗定搞得人紧张，我在罗定很想睇书，但我从不敢入去罗定书店，只是到书店门口望一下，因为我自己身份不同，入去就会被人盯实，那就“死火”了。因为我做组织部长，入去被人拉去不得了。四会书店在宣传群众方面起了很大作用，特别重要的是团结了一部分小学校长。

在工作方法来说，四会当时是采取比较秘密办法的。当时，特委总机关（在王均予任职时）是在广宁石涧，宣传部在四会，我住在罗汶白花带洞坑里头，是分散来住的。但开会多数来四会。我记得特委在仓岗开过会，在艇仔开过会，（现在不知是否还有艇仔？）租个艇仔让它在绥江河中游来游去，我们就在里面开会。在谢剑影家里也可能开过会。我不是经常住在那里的，有些具体情况又知道些，又不是好清楚。这两天同志们讲地方党问题眉目已经清楚了，我现在只是帮助证实当时确实是这样的。

我觉得有个很值得注意的问题，就是黄田江头一带地方，为什么能够长期坚持下来。大革命失败以后虽然较隐蔽，抗日开始时，那里就好注意发展农民党员。最困难的时候，我们的交通站始终继续坚持，无倒过。别的地方倒了，黄田无倒。为什么它无倒呢？我想过这个问题，大概有几条：第一有真正革命的传统。从大革命的陈伯忠开始到以后解放战争时期的陈子英、陈子贤这班人，都有个传统在那里。加上我们建立了政权之后，即是以五指山为根据地建立了政权以后，地方

采取白皮红心的办法，对地主，对国民党的乡长、保甲长都有一套统战的办法。工作比较隐蔽，又有群众基础，所以能坚持下来（温盛湘插话：还有一条很重要的就是它始终有党组织在）。有组织嘛，有群众基础，再加上我们采取两面政权的办法，所以它无倒，继续坚持落来。

当然，四会地下党的工作，也有不够的地方。不够的地方大概有两点：一点是组织起义时太彻底了。老欧你看这条对不对？特别是黄岗那里，全窝端，造成好大困难。所以，后来我派肖占文和陈德返回来活动，他们遇到很大困难。这个问题，一个是我们同志热情，谁都想参加工作，参加武装；一个是我们无经验，主要无经验。这是第一个缺点。第二个缺点是，那时被敌人追赶，忙于奔命，搞武装工作，对地方党工作有所忽视，使我们后期工作造成一些困难。地方党我知道的大概是这样的情况。

至于武装起义情况，主要是欧新他们来组织咯。当时的基础有黄显声部分，还有陈甦（陈铮郎）部分，合起来组成一个四会大队，参加了起义。起义后都是出生入死做过好大贡献的。以后我们以五指山周围包括黄田、江谷以至威整等地方建立了政权，不少四会子弟参加了我们的队伍，做出很大牺牲。但是要说清楚一个问题，由于会、宁两个地方是分不开的，在大革命时期都是一致的，在抗日战争，解放战争时也是一致的。在平原搞武装斗争不容易，我们就是靠五指山区，依靠山地打出来。因此，武装斗争是依靠五指山区。在平原多数是武工队活动，大队伍需要转移，需要活动时才活动。所以四会作为全局来说每个地方都可以行，但是在平原主要采取武工队的方式。在大南山是陈德和林鹏两个队，

江谷那边是江金，采取武工队的方式活动。

四会起义与广宁起义，在我们的革命历史上是很重要的，要有个应有评价。珠纵上来后，大家互相配合，情况就好了。

珠纵是五月三号还是四号到四会，我记不清。过马房时是欧伟明去搵船的。他记得清楚些。是在现在马房桥墩那里渡河的。当时有几百人。我们是三月接到省委命令，副司令员谢斌接到命令后就到二支队去组织了。周锡知道这个事。我在中山迟些来，反正我赶上队伍一齐走。大概是五月初旬渡江。在望楼岗被日本仔袭击了一下子，这次袭击死了两个，伤三人，到陈甦家住了一晚。那晚天很黑，又落雨，行了成晚只行堂把路，在陈甦处住了一日不是一晚，然后到贞山住，稍为休息两日，那时已经同广宁欧新他们接上头了。我们到四会时是黄显声、陈甦、陈德他们接济的。不是他们接济我们怎能渡河，怎能平安到贞仙祠？我们上来，敌人是清楚的。所以到罗汶第三日就发生黄鸣战斗，打个平过。接着是横山战斗。横山战斗我们大概死伤七人，敌人也死伤了相当部分。横山战斗打了一天，打得好激烈，已经搞到枪对枪了。跟着我们又进行莫村战斗，我们的子弹打得差不多了，算了，就不敢打了，无同他缠就走了。我的右脚患了急性关节炎，大家抬我走，那时很被动，我们想找出路，一个办法是打石狗。打了石狗之后，牵制了敌人，我们入去黄牛头即四会高要交界的黄牛头休息。在黄牛头的山顶过“七一”，庆祝党的生日。以后，叫个反骨仔莫六做交通，由他带到金坑迳，结果被敌人伏击。这次伏击正好打正我们中间，伙夫呀，几个“么啰嗟”呀，工作队呀，油印室呀等之类部分，前、后头的部队都没有什么损失，上山时我们的队伍仍是比較完整

的，只有一个小队走散了。这场仗有人说损失好大，照我来计，大概被他们捉了十一人连同四个“么啰嗟”和丢失一条镜枪。走散的人后来也返来了，这不能算损失呀？蔡仔、适仔同李子英等以后又慢慢回部队来了。走散的那个小队也回来了。当时部队的思想很乱，一个女的同一个班长蔡九，一个伙夫逃走了，这是我们部队最不稳的时候。从望楼岗战斗至横山战斗到这个地方，大概我们损失三十人左右。我记得，我们离开金坑之后，就到了黄坑开会，小林（梁广）参加，总结经验教训，决定分兵三路：一支队伍去了广清边，一支队伍去了广怀边，一支队伍去了广四边，这是最后的决定了。分散活动，集中打击敌人。因为河西那边回旋地方不大，我们决定把在河西活动的部队接过河东。为了掩护我们过河，同时牵制敌人，迷惑敌人，所以叶向荣同陈肇文、冯光这几个人继续在河西活动。他们大摇大摆去森膺洞、木格，敌人以为是我们的主力部队，追上去了。我们渡河到了五指山后，他们才知道上当。我们到了五指山打了两场仗。然后到了五指山黄义厚处叫上帝顶，在那里整顿一下。杀了两头猪，一头牛，大家吃饱精神又来了。到五指山第一仗是小接触，休整后打第二仗，这一仗打得漂亮。打了这一仗之后，敌人就不敢追了。以后我们队伍就过江屯，这样很快就把局面稳定了。正在这时，我们接到命令，说王震、王首道部队南下，要我们上五岭迎接。江南部队罗范群他们同谢立全在都骑等我们，我们也在那里准备迎接。但不久又接到命令叫不用去了，王震已经转头了，那时日本仔已投降了，我们就在这里坚持下来了。这个命令只是我们司令部几个人知道，无传下去的。